

前言

佛教始于佛陀的睹星澈悟，而开示教法与创立教团，至今已逾 2 千 500 年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佛教的世谛流布，由于因应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文化区，以及不同的世道人心，而产生不同的方便适应。这些因应世俗而巧为施设的方便之道，在时间的源流中沉淀，遂形成了佛教中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成为佛教谛理的一部分。

20 世纪的百年间，世界经历了几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科技的长足进步、信息传播的益加发达，使得时间的轮子转动得更快；20 世纪的中国佛教，也处在新旧世界的夹缝中，面临了存在与消亡的挣扎，而经历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革新运动。在思想与理论层面，则有“人生佛教”乃至“人间佛教”的倡导，而以印顺导师的“人间佛教”思想体系最为完整。

印顺导师提出了“契理”与“契机”来作为人间佛教乃至未来佛教发展路向的实践原则。本文即依循此二大原则，来思索新世纪的佛教青年对新世纪佛教学理应具有的正知、正见与责任。

新世纪与佛教青年

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长权威极强的社会，越是年届宿耆者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越大；家族内的一族之长，更是族人仰望的中心，具有约束族人的公信力。但这样的社会传统，已随着专制政治体制在 20 世纪初叶的崩溃而瓦解；新的社会、新的时代里，年轻人成了社会的动力来源。

而在科技日新又新的当儿，知识的折旧率之高，使适应能力较强的年青一代，成了社会的新主人。中国佛教从古老的传统社会中传承而来，无可否认地具有适应老年人的宗教本质，但这是社会适应而使之然的，不可说是佛教的本质。

佛教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，使之更适应现代的世道人心，也即是如何由圣义谛而开展世俗谛，因第一义悉檀而次第开展对治、各各为人、世间等诸悉檀，这应该是当代佛教青年所关心的首要问题。

佛教得进入青年人的生活圈中，才不会被视为古老、落伍的、一条未被剪去的满清辫子，这是契合时代之机的。但青年是否需要佛教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如果只是为了迎合青年人之所好，而对佛教进行了无谓的改造，则佛教不但未得其益，反而引致无穷的祸害；对青年人而言，也只好提供了一个团体活动的空间，而不能从中得到佛教的法喜。因此，任何的方便应机，首先需考虑的，便是“契理”的问题。

“佛教青年”，是否即同于一般的信徒？当然不是。青年人的特性之一，便是具有很强的求知欲。就此一特性来塑造佛教青年，则佛教青年应该是对佛教的根本教理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，并清楚地知道佛教与非佛教的界限，才称得上是佛教青年，与一般只懂膜拜求平安的信众，是有所区别的。

佛教青年的佛陀观

传统的中国佛教，经过与中国传统的儒、道思想的交激与协调之后，儒家的入世、淑世性格，使外来的佛教不得不往出世的一面去发扬。

加上皇权统治时代，统治者的喜怒好恶，对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之存亡之虑，往往有巨大的影响。

于是，山林佛教大为发展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隐逸性格。因此，在中国人的传统意境中，入世的归属于儒家的事务，唯有出世的解脱事务与佛教有关，似乎解脱与现实人间的生活成了两不相及的事，解脱的追求意味着对人间现实的割裂与离弃。

如此意义的佛教，只有对那些耆老者、宦场挫折的士大夫或遭现实生活重重打击的失意人，才能激起信仰和追随。对于这一类的“人生失败论者”而言，佛陀的愈是大雄大力，对他们愈是激起信靠之心，祈望仰赖佛陀的大神力，可以引领他们超脱人生的苦海。

原本现实人间出世的佛陀、自力解脱的佛教，在时代因缘之下，遂转而成成了世外天神降世、他力接引往生的神教。

时代因缘改变了，佛教的适世方便亦应有所变易，以契世机。

新世纪的佛教青年，必须从佛教神教化的框框中超脱而出，认识到佛陀的现实人间性格。皇权统治时代，统治者高高在上，君临万民，普罗万民在统治者面前正眼都不敢抬望；在此情形下的佛教，也必然具有权威性格，佛陀高据上位，神临信众，与佛徒百姓之间，保持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，一如皇帝与百姓之间的界限不可混淆一样。

尤有进者，甚至不惜于伪造经典，以当今的皇帝匹配佛陀，如唐代时期出现的《大云经》之类的经典便是。因此，皇权统治时代的佛陀，多处于天界与神殿之间，不

亲近人间生活，与百姓生活之间的联系，只有一柱清香。

新时代的佛教青年应该认识到佛陀的现实人间性格：佛陀生于进入文字历史时代之前的印度，后世辗转写定的佛陀传记，难免会依据佛弟子的理想与想象而加以神化，但佛陀的人间行迹与原始圣典的记载，其言教与身教等，在在皆显示他是一个现实人间的行者，依据当时的时代风气而出家、修行，仗凭自力的定慧双修而睹星澈悟。

佛陀的现实人间性格，不必与遥遥天外的大力梵神搭上关系，这样非但不会灭减了佛陀的光辉，反而更显出佛陀的可贵性质。

佛陀与你我一般，是现实人间的一个“人”，而且唯有“人”，才具备了修行佛道的条件，显示“人”这一生命形态的可贵与人身的难得，“人”与佛在“人身”的这一条件之下平等了起来。

这正如民主宪政时代的国家元首一样，并非是高据上位，拒万民于千里之外的尊贵阶级，选民可以推他上台，也可以拉他下台；选民如果具备条件的话，也可以被推选上台。

就选举与被选举这一方面来说，国家元首与普通选民的权力是平等的，并没有森严的阶级判分而不可逾越。佛陀与佛弟子之间的关系，也如同选举人与选民的关系一般，原始佛典上记载的佛言，申明“我亦在僧数”，佛陀完全把自己消融在他所组织的出家教团之中。佛弟子对佛陀的恭敬，是对佛陀智能化导的一种自发性的感恩，而非对外在权威的畏惧，或外力诫约的要求。

有了“佛出人间”乃至“佛在人间”的认识，就可以厘清佛教与神教的界线，也不再受神棍或诸多新兴教派挟神迹以惑众了。

佛教青年对人间的佛陀生起了深切的信心，也即是对自己、对人类的本质生起了信心，可以活出人性的尊严，并力求逐步地提升，以臻佛陀大智慧的境界。

3/7/2003 《南洋商报》